

（二〇二〇年二月三日出版）

---

本期目录

---

【亡灵祭坛】	傅其芳、姜永宁、容国团之死	金 汕
【往事非烟】	父亲让我去问江青	张美音
【一家之言】	戚本禹谈毛泽东	孟祥才·戚本禹

---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

【亡灵祭坛】

傅其芳、姜永宁、容国团之死

• 金 汕 •

◇ 傅其芳之死

1968年4月16日，从国家体委训练局大楼里，抬下了一具尸体。这尸体魁梧壮实，但已经是遍体鳞伤。从面部表情看，生前的痛苦全然解脱了，也不像以往上吊的人那样吐着舌头，好像他是非常平静而又深思熟虑地去迎接死亡的。

他躺下了，不失是一位汉子；他站起来，更不失是一位英雄。

他就是傅其芳——我国登上世界乒坛最高峰的重要设计师，男子团体、男子单打“三连冠”的总教练。在乒乓球坛，他是一位运筹帷幄、用兵如神的大师，有几个中国队的强敌绞尽脑汁地想把他斗败，但都被他屡屡捉弄，他们后来都感叹没有傅其芳这样一位帅才。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却容不下他，把他推向了绝路……

暴力，不能保证诋毁的成功。他那曲折的人生轨迹，已经为他做出了回答。

▲ 岂有这样的“特务”？

人的痛苦莫过于用自己的手来结束生命。4月15日晚，傅其芳在牛棚里做着生与死的最后抉择。

“傅其芳，交出你们这个潜伏的特务组织！”刚才他还听到这声色俱厉的审问。

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他一直在回忆着他在香港的所有经历，但他既没有与任何特务组织挂钩，也不认识任何一个特务。自己为什么从香港回大陆，他心里最清楚。

傅其芳1923年生于宁波，自幼丧父，后随家庭迁居上海，饱尝了人间的辛酸。在上海的钱庄里，他当上了小伙计，也对打球着了迷。他个子高大，身手矫健，正手扣球与反手推挡都疾如流星。不管生活多拮据，也不管失业的危机时时袭来，他只要站在墨绿色的球台旁，便荡尽了所有烦恼。家里对他饿着肚皮打球都不大赞成，直到他第一次喜笑颜开地拿着挣来的钱交给母亲时，家人才知道他打球的厉害。以后他就靠着这块几两重的球拍，维持着全家的生活。这在40年代的上海滩是多么不容易！

1949年，傅其芳去了香港，因为香港的乒乓球水平高于内地，球员收入也相对高一些，更吸引他的是常有机会与外国名手比赛。出于对乒乓球的爱好，为了不致在球坛沉沦丢掉饭碗，他练得很苦，球技也达到炉火纯青的境地，他代表香港去参加第19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那时欧洲人看不起中国人，英国人尤其看不起他们殖民地内的中国人，但傅其芳却用他的快速推挡和凶猛扣杀，打得获得过世界冠军的英国队的保格曼和李其无以喘息，赛前还对他藐视几分的英国名将最后无精打采地败下阵来。

他成了香港人心目中崇拜的球星，他击球的英姿在各家报纸上登载，他受到了同胞们快捷式的欢迎。但他的激动却莫过于一位华侨女教师对他一句力重千钧的话语：“你如果能代表祖国就好了！”是啊，那时他的脑海中一直在翻滚着一连串的问号：是代表几百万人的香港好还是代表几亿人的中国好？若要攀登世界水平，在香港可能性大还是在大陆可能性大？

1953年，傅其芳毅然回到大陆。他忘不了通过罗湖桥时那兴奋愉悦的感情，忘不了他穿上印有“中国”两字运动衣时胸前沉甸甸的感觉，还有他第一次亮相，祖国人民对他的到来所发出的长时间掌声。从那时起，他就把他的心献给这片土地了。自己哪有不当特务的半点心思呢？

这一夜他仍然无法入睡。惨淡的月光照进凌乱不堪的牛棚，照在供他交代用的一叠厚厚的白纸上。还想提起笔再写点检查，以得到造反派的谅解，他有过无数次这样的期望，但最终带来的是更多的祸。检查写得越长，专案组就盘问得越仔细，来龙去脉交代得越清楚，追查的头绪就越多。

哎，这永远赎不完的罪！他猛然想起自己头上不仅仅有“特务”这顶帽子，还外加“资产阶级分子”和“贺龙修正主义集团红人”两项帽子，历史的、现行的、政治的、生活的，样样俱全，这么多帽子，何时才能脱干净呢？

如果傅其芳平平淡淡，既无棱角也无光辉，他绝对不会惹来这么多麻烦，归根到底，他犯的还是“冠军罪”！

### ▲ 亘古未有的“冠军罪”

傅其芳50年代中期担任中国乒乓球队教练，中国尚与冠军无缘。要想跨出这一步是多么艰难！世界上各种打法争奇斗艳，各种流派雄踞一方，学欧洲的固守还是学日本的猛攻？学荻村的全面还是学别尔切克的稳健？傅其芳这位既有眼光又有魄力的教练指出：“要走中国人自己的路，那就是‘快攻’。”这提法在今天也许是司空见惯，但在人们没有认识它的时候便能预见，这正是一个优秀教练员最重要的素质。为了完成他的设想，他艰难地、一步步地探索着。他既重视优秀运动员，也把眼睛盯在那些不知名的后生身上。1953年，他听说北京少年宫有个中学生庄则栋，便特意去看他的比赛。一些行家说，这个小孩打球不正规，劈里叭拉乱打一气，世界上也没有他这样的两面攻。但傅其芳一眼就认准了他，非要把他选进国家队。他找到庄则栋的教练庄正芳，庄正芳告诉他：“小庄的父亲是医生，人家有

志于让儿子上清华、北大，不想打球。”傅其芳却说：“你磨也要把他磨下来。”过了些日子，庄正芳告诉傅其芳：“磨了多少次才磨下来，但小庄正上高二，家长要求上完高中再去。”傅其芳斩钉截铁地说：“高中也不能上完，要让他马上来。”事实证明，他的努力实在值得。

傅其芳胆大心细，在与外国人斗智斗勇时，他绝不让分寸。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前，他得知强敌日本队发明了弧圈球，他们横扫欧洲，使各队谈“弧”色变。但弧圈球谁也没有见过，傅其芳绞尽了脑汁，通过在香港的老朋友打听一些情况（这在“文革”中自然也列入“特务”行径），又派庄家富去观察，带回了情报。接着他让几个选手苦练弧圈球，使主力队员适应各种怪异刁钻的打法。但是傅其芳不露声色，任凭日本队去渲染鼓噪。到1961年4月9日中日两队决战，由弧圈能手星野对小将庄则栋首先亮相时，日本人才发现中国人根本不怕弧圈球。中国选手速度之快常常使他们疲于奔命，顾此失彼。这场团体赛仍然打得很艰苦，日本队凭借他们丰富的经验抵消了速度的不足，他们死死地咬住中国队，整个比赛大厅紧张到仿佛划一根火柴就会燃烧似的，连一些身经百战的中央首长都退居休息室，让秘书给他们来回通报比分。傅其芳临危不乱、泰然自若，他沉着冷静地给队员们布置战术。当中国以5：3获胜时，整个中国为之沸腾了。当时正值困难年代，人们不仅为夺得冠军而振奋，更重要的是从中国乒乓球队身上汲取了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

傅其芳更感到责任重大。日本队决心在第27届比赛中洗去耻辱，他们耗费了数百万日元拍下中国队的技术动作，并频繁地与中国队交往。傅其芳虚虚实实，让秘密武器张燮林只露一面，把木村、三木弄得不知所措后，马上见好就收，造成对方心理上的压力。1963年春，中日两队又在布拉格相遇，日本教练神机妙算，预料到中国队庄则栋将打第一主力，而荻村又比较惧怕这头小老虎，所以排阵时让荻村避开庄则栋，先碰张燮林，以扬长避短。但傅其芳更敢下赌注，他把实力最强的庄则栋排到第三号主力，让张燮林充任头号主力，这一下日本队慌了手脚，他们在谋略上已经完全失算，结果以1：5的更大的劣势败下阵来。只有出奇方能制胜，傅其芳是熟谙此道的。当中国人刚刚走向世界体坛，经验缺乏，信心不足，甚至有些外国不友好人士常常从中作梗时，我们多么需要这种能够开创局面、有魄力、有见解的优秀教练啊！

60年代中期，还没有一个教练取得傅其芳这样的成果、正因为如此，他才受迫害最早、结局最惨，这亘古未有的“冠军罪”啊！

从4月15日晚到16日清晨，傅其芳不知醒了多少次，精神上的痛苦会把他催醒，身上皮开肉绽的伤痕更不止一次地使他疼醒。他昏昏沉沉，幻觉中有彪形大汉在围着他痛打，他惊恐地捂着头，卷曲起身躯；他也偶然做着美梦，自己在颁奖台上扬眉吐气，但一看最终的下场，也只能是一声长叹。

他实在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招恨”。乒乓班斗完了体委斗，体委斗完了各运动队斗，批斗时挨打，审讯时棍棒如密密的雨点，莫非自己真是十恶不赦？

他脾气不好，给傅其芳当过队员的人都知道，他非常严厉，急了说话都带刺儿，显得有些刻薄和飞扬跋扈，但这只是缺点不是罪过啊！况且，哪一个能培养出杰出人才的指挥没有个性呢？从暴躁得像狮子般的魔鬼大松博文，到统帅千军万马的彭德怀，有几个是温吞水式的性格呢？

他不拘小节，酒瘾上来能喝10瓶啤酒，常常弄得酩酊大醉。有一次和一个同辈人打赌，他喝一大碗，那人喝一小碗，看谁最终获胜，但要允许上厕所。两个人到后来都飘飘然了，胜利者却是傅其芳。这的确有失一位名教练的风度，但事后他总是惭愧地看待这类事。

他在旧上海、香港多少沾染了一点花钱大手大脚的习气，有时弄得囊中如洗，不得不张口借钱。他工资不到200元，要负担两个家。而中国由于多年的历史沉淀，对结过两次婚的人过于敏感，到了“文革”中更可以有不负责任的胡编渲染，他又成了十恶不赦的罪人。这种种污水向他泼来，他难以承受。过去他觉得组织上信任他，贺老总理解他，当他迟迟不能入党时，贺老总说：“为什么不发展傅其芳？你们不当介绍人，我和荣高棠当。”多么体贴人的老总啊！可现在还有什么盼头？不仅无处向老总伸冤，老总自己都不知被关在何方？啊，回大陆十几年，他始终发自内心地紧紧跟随时代步伐，他茫然过，他痛苦过，他却不曾怀疑过，就在1959年，他以教练身份去参加在西德举行的世乒赛，但有关方面突然要求严格控制出国人员，傅其芳作为教练竟被留下，他难过了许久，他依然留在北京训练年轻运动员。后来，他终于被信任了，他珍惜自己多年努力得到的“信任”，并惟恐失掉它。如今岂止是没了“信任”，简直成了恶贯满盈的敌人。哪一个正常人能经受这种精神折磨啊？

一夜快过去了，晨曦一点点地增加着这间屋子的光亮，窗外响起了雄壮的乐曲，天天讲的阶级斗争又要开始了。他为了不再挨斗、挨打、受辱，只有一死！他想起了远方不足10岁的儿子，还有即将守寡的妻子，心中涌起无限的惆怅。

傅其芳听到屋外已没有动静，原来看守他的专政队员去出操了。要死就不能错过机会，他迅捷地跑进旁边的小屋内，用插销将门插上，在窗户上系好绳子，把自己的脖子套了进去。

当人们找到傅其芳时，他已经直挺挺地挂在窗上……

#### ◇ 姜永宁之死

1968年春，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大院里，一个身材不高穿着整齐的中年人正在聚精会神地看着一张大字报。一个比他稍稍年一长的人用浓重的广东话低声地说：“听说国家体委造反派已经把傅其芳专政了，将来咱们也麻烦。”

“不会的，我们早就说清楚了。”

那个看大字报的中年人，是50年代初中国乒坛的继往开来者姜永宁；另一个也是名将，叫王锡添。这两位宿将早在香港就名声大震，姜永宁直拍削球，足智多谋，号称“狐狸精”；王锡添横拍削球，骁勇善战，人称“小霸王”。不知哪位造反派得知了王锡添的雅号，告发他在香港是个大恶霸，否则何以叫“小霸王”？王锡添已经受了审查，又闻傅其芳进了“牛棚”，他预感到他们这批香港归来的人都不会被放过，便来告诉这位挚友，让他有所准备，但姜永宁历来相信党的政策，他反倒安慰起老朋友来。

在那个年代，虽然天天在念“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但没有一个角落不在践踏法制和人的尊严。没过两天，一张爆炸性的大字报出现在先农坛，醒目的标题是“揪出日本大汉奸姜永宁”。“文革”中凡揪则“大”，“大特务”、“大右派”、“大汉奸”，轮到姜永宁自然也是“大”。

一向喜欢看大字报的姜永宁看见这几个扎眼的大字，一下子惊呆了。他从来没有这么伤心过，他始终把回到大陆作为最值得庆幸的选择，把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一大作为最令他留恋的日子，他怎么会被视为大汉奸呢？他委屈得直想流泪，但又找谁诉说呢？那令他辛酸的往事又在他眼前翻滚：

姜永宁的童年充满着屈辱，他父亲遗弃了他的生母，他跟着改嫁的母亲来到继父家，当木工的继父收入微薄，怎么可能养活他和哥哥呢？两兄弟很要强，他们常常背土筐子，到乱糟糟的码头，用手扒开垃圾，拣出一粒粒煤渣。拣完一筐筐煤后，小小的身体也像刚从煤堆里拉出来。稍大一点，他又开始给资本家倒尿壶，给日本人擦皮鞋，这大概就是汉奸的由来吧？他实在想不起和日本人有什么来往了。

读了大字报的标题，姜永宁的额头已经冒开了冷汗。他胆子小得出奇，向来都是息事宁人、与世无争，他到任何地方也没有对立面，与他共事的人都知道他是罕见的大好人，但大字报为什么也不放过他呢？“姜永宁40年代就是日本大汉奸，解放后他迫不及待地回来，这一切值得革命群众深思……”

那龙飞凤舞的黑字像蹿出纸面的毒蛇，狠狠地吞噬着他的心。

他回大陆是为了破坏吗？那还是1952年，他荣获了香港单打冠军：这个冠军真是来之不易，他先在乒乓球房为别人拣球，后来又充当陪练，那真是一步一个脚印熬出来的。同年，中华体总广东分会邀请他代表广东参加第一次全国乒乓球赛，他取得了新中国第一个冠军。有人给他带话，贺老总希望他留下来，代表中国队比赛，他在香港的一切待遇都可以保留。姜永宁当时已是《星岛日报》的职员，在球坛的显赫名声使他有了一份稳定的职业，但他对比了香港和大陆，他觉得强大的祖国才是久留之地。至于待遇，他听说别的教练工资不高，便执意要把从香港保留下的工资降下来，只是体委领导再三做工作，他才收下每月135元的工资。

那是1955年，中国参加了在东京举行的23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国队遇到的净是美国、南韩、南越这样的队，这不仅仅是比球技的高低，更溶入了冷战时代志气的较量。在与南韩队对垒时，他们向国内转播现场实况，一口一个“打败共匪”。姜永宁毫不退缩，用惊人的毅力一板板地与对方周旋，为得到宝贵的一分，常常要打几十个回合，他的腿抽筋了，浑身湿透了，还是咬紧牙关与对方磨。三场重要比赛，他都是独拿3分，他用无比的艰辛维护了祖国的声誉，为中国队首次跻身一级前六名立下了头等大功。有哪一个对祖国不怀好意的人会如此珍惜国家的荣誉？

姜永宁当晚回到家中，把大字报的事告诉了妻子孙梅英，这位打球向来泼辣凶狠的乒坛女将比丈夫豁达得多，她说：“让他们写去，现在的大字报有几张是真的？”

但姜永宁心里盛不下事，他敏感地观察着周围的一切。整人的人对他已经透露出了凶残的光，一些熟人生怕与他说话受嫌疑，他教过的小队员也总是充满疑惑地看待他。这日子多难啊，遭受歧视真是最大的痛苦了。不久，他又听说了傅其芳自杀的消息，他的处境无法对这事做任何评价，但他无意中在几位队员面前说：“傅其芳自杀的时候把绳子勒在耳朵后，那样死不伸舌头，样子也不难看。”莫非这时候他已经考虑着走傅其芳的路？

姜永宁为人善良，凄苦的童年造成他逆来顺受委曲求全的性格。事到如今，他也不想去揭发任何人，他只是反复寻思是不是说过错话，平日的书信中有没有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地方。他觉得应该认真清理一下。

他对孙梅英说：“我准备把往来的书信都烧掉。”性格倔强的孙梅英说：“有什么好烧的，不要理他们那一套。”

但姜永宁仍旧拉开一个个抽屉，翻箱倒柜地整理带有文字的东西。孙梅英看着他那副如临大敌、优柔寡断的样子，既觉他诚实得可爱，更觉得他紧张得可怜。丈夫就是这个样子，几年前他们在国家队分别带一个队员，本来孙梅英的学生很怕姜永宁的学生，但孙梅英深知丈夫处理事不果断，便抓住他的弱点布置战术，结果自己的徒弟反倒大胜丈夫的徒弟。如今，他又在嘀咕，在他眼里没有一封信符合毛泽东思想。这绝不是伪装积极，他从心灵深处钦佩党、信服党，平常都按照党章来对照和行动，在家里也不说一句不利于党的话。有一次，收音机正唱山西梆子，孙梅英说：“咱们也听不懂，关掉它。”姜永宁说：“没唱完怎么能关掉，人家唱的是毛主席语录。”还有一次，孙梅英管了一个品质不好的队员，她回家唠叨：“教这样的队员非让我少活几年不可！”姜永宁坐下来，很有耐心地开导孙梅英说：“别生气，毛主席他老人家在老三篇中这样教导我们，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着人民的利益的……”思想上如此追求进步，胆子又这样小，如今又遇上这么大的事，真成了惊弓之鸟。他一张张地烧，弄得屋内烟熏火燎。孙梅英开门疏通一下空气，哪料隔墙有眼，被邻居汇报上去，又添了一条“销赃灭迹”的罪状，更大的迫害向他步步紧逼！

5月10日晨，姜永宁离开家，他又忧心忡忡地叮嘱妻子：“四旧的东西再清理一遍扔掉。”为了不让丈夫挂念，孙梅英决心把照片等东西全烧掉。整理到下午，她的队员、女乒国手仇宝琴来看她，关切地说：“我来帮你整理。”一会儿，曾获世界冠军的林慧卿也来了，爽直地说：“你给我，明天早上我扔到锅炉里去。”孙梅英想，现在什么事都“有风就是雨”，如果万一让人看见，又成了转移黑材料，还是自己处理吧。为这件事，孙梅英后悔了多少年。

下午5点，北京市体委专案组七八个人闯进了姜永宁家，先是大念“什么人站在反革命立场就是反革命派”的语录，接着向孙梅英宣布姜永宁已被专政。孙梅英想起中央曾发过不让抄家的“六·六通令”，便说：“‘中央六·六通令不让抄家。’”孙梅英太书生气了，那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年代，专案人员向她大喊：“不抄革命群众的家，就是要抄反革命的家！”他们又乱抄一气，并拿走了那一包照片。

专案人员拿到照片欣喜万分，他们从里面寻找着立功的机会，有人发现姜永宁少年时代拍的照片，衣服上有个小小的太阳旗，他们逼迫他承认是“日本狗特务”。姜永宁一再心平气和地解释：“那时卖的衣服常有太阳旗，我和日本人没有任何往来。”几个彪形大汉干脆抄起棍棒，朝姜永宁劈头盖脸乱揍，可怜瘦小的姜永宁被打得在地上爬，又下意识地钻到床底。

这是5月15日的夜晚，姜永宁在拘留室里像一座呆呆的木雕，他都顾不得去擦脸上的血痕。谁见了这位善良老实人的遭遇，也会禁不住流泪。他曾经如此深沉地挚爱着这里的一切。3年前，他从国家队被调到这里担任北京队总教练时，谁都知道这意味着出国、出名的机会少了，但他心情舒畅地接受了。为了带好队，他干脆住在运动队，每天5点半钟起床，6点半钟便来到训练馆，从辅导队员到打扫卫生，从示范动作到给小队员当陪练，他都干得兴趣盎然。一天的训练下来疲惫不堪，但他常常拉着小队员回到球台旁，说：“我再逼你一遍。”入夜，他又要写训练计划，他知道他不善辞令，一个十几分钟的发言他会写上3个小时，他沉默寡言，显得有些冷峻，但他内心却犹如一团火，观众来信向他询问打球，他有信必复；边防战士希望要好球拍，他买到后工工整整地钉在木箱内寄出，这在造反派看来也是

罪状，因为姜永宁是典型的“好人党”。“文革”的“好人党”是指不能处处以阶级斗争为纲，姜永宁的确是个头上不长角、身上不长刺的老实人。

5月16日清晨，王锡添看着他肿胀的脸，小声问他：“他们打你了？”姜永宁摇摇头，他不敢说挨打了。

队员们出操去了，姜永宁把造反派勒令他打扫的厕所擦得干干净净，便独自走到4楼的一个房间里。人们回来发现姜永宁失踪了，便到各个房间去寻找。他的朋友王锡添看见他站在窗口，以为他要跳楼，便含泪隔着门大喊：“姜永宁，你不要想不开，不要做糊涂事。”但姜永宁仍纹丝不动，人们打破玻璃跳了进去，姜永宁吊在窗口，已经断了气。那绳子真像他说的是勒在耳后，舌头没有吐出来，样子一点也不难看……

#### ◇ 容国团之死

一个人，当他选择离开人间到另一个冥冥世界去的时候，他的痛苦是不言而喻的，那对亲人的怀恋，对往昔美好岁月的追忆，以及对眼前世界的无奈，各种错综复杂的感情，都会在心中像潮水般的汹涌。

1968年6月20日，从国家体委大楼里走出了一位年轻人，他刚刚参加完批判大会，满脸愁云，双眉紧整，一双大眼似乎心不在焉地扫视前方，这种异样的表情并没有引起人们的留意。因为那时，这绝望、憔悴的面孔，在凡有人群的地方都会见到。

他，拖着像灌了铅的腿，迈着沉重的步伐，回到了家里。他留恋地看着这个刚建立三年的温暖的小家。他眷恋贤惠的妻子，疼爱不满两岁的女儿，更牵挂与他相依为命的老父亲。他知道，自己就这样走了，会给家庭带来怎样巨大的悲怆！

但，他是个男子汉，又有着十分执拗、甚至过于执拗的个性，一旦选择了一条路，就义无反顾地走下去。他颤巍巍地拿起了笔，用泪、用血、用生命写下了临别的心声：

“我历史清白！”

“不要怀疑我是敌人！”

“请允许我最后一次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他郑重地把遗书放进自己的口袋，又装进了一条尼龙绳……

妻子黄秀珍回来了。她知道丈夫心情不好，政治风云变幻，她已做好准备，一旦他被拘留，自己也要前去和丈夫一起过“牛棚”生活。她一边想着心事，一边把晚饭端到丈夫面前，一同吃起来。

“今天的会有什么新情况吗？”妻子看了看丈夫的脸色问。

“还不是老样子，总免不了要揪我。”丈夫眼里闪动着愤怒的光泽。

“你怕什么，事实总是事实。”妻子像往日一样抚慰着。

妻子要开会去了。他欲言又止地望着妻子，眼神中蕴含着深情、哀伤和歉疚。因为他决定远行了。

他走了。走向遥远的“天国”。他是一个普通的人，却也是一个非凡的人——他为中华民族体育争得了第一个世界冠军，是我国体育史上当之无愧的英雄。容国团，你这响亮的名字，曾震撼了多少人的心灵。容国团，你不该匆匆离开你热爱的球台，不该离开你心爱的亲人，更不该舍弃你的青春与生命。走上这一步，到底是为什么？

难道他意志薄弱？

对于一个名人之死，人们总是想把来龙去脉弄清楚，这也是对历史负责任。在那特殊的时代，在众多受凌辱的人中，为什么他偏偏要以死抗争呢？

可是，在人离世前，不会像摄像机一样在大脑皮层留下记录。而那个年月也太黑暗了，别世的人，留下的遗书也只能是经过筛选的话，因为他们还要考虑到尽量少株连自己的亲属。他们甚至不能像革命先烈那样，在公开的敌人面前，痛快淋漓地倾诉自己的愤恨。

在人们印象中，大凡寻短见都是意志薄弱者。其实也不尽然。一个从各国强手的密林中冲杀出来的人，一个代表中国率先登上世界冠军奖台的人，必然有着超人的意志和品格。

容国团是从苦难中崛起的。在50年代初，在还谈不上繁荣的香港，他13岁因生活困难而退学。因肺病折磨得瘦骨伶仃的他，打过杂，搬运过又脏又腥的鱼。在老板的呵斥声中，他没有半点的媚骨。那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周年的时刻，16岁的容国团兴奋地参加了一场迎国庆的乒乓球表演赛。鱼行老板暴跳如雷，向容国团发出警告：“你马上给我写悔过书！”容国团毫不示弱地回答：“爱国无罪，不能写悔过书。”老板再度紧逼：“你要考虑后果。”容国团更是斩钉截铁：“人头落地也不写！”

他果真辞退了工作。鱼行老板自知赌注下错了。他并不看中容国团的力气，他只是为自己的球会少了根台柱子而后悔。老板不得不反过来加薪，求容国团去球会打球。容国团不是为五斗米折腰的人。他一口回绝：“不去！我人穷志不穷。”

1957年，他怀着当主人的心情回到了大陆。在跨过罗湖桥的第一天，他激动地在日记中写道：“这是我走向新生活的第一天。当我踏入广州体育学院所在地时，早已相识的乒乓球运动员纷纷向我握手问好，表示热烈的欢迎。这时候，我心里充满了幸福感。很久以前，我就想成为他们当中的一个，现在终于如愿以偿。1957年11月1日夜。”多年后，他还这样评价自己的父亲：“我一生最感激父亲的，就是他支持我回到社会主义祖国来。”

容国团的意志和品格更体现在对待理想与事业上。他回来后，周密研究了世界乒坛的现状，感到自己应该为国争光，去争取中国人从未得过的世界冠军的金杯。他在省体委提出，要在3年内夺得世界冠军。不少人摇头、怀疑。他身体不好，名望较荻村、别尔切克逊色多了，又没有参加过世界性比赛。他对此只是付之一笑，对他能力的怀疑只能是一种新的动力。为了使自己适应未来的鏖战，他练长跑，练举重，练跳绳。半年过去，他的体质增强了，变得强壮潇洒。而他的技术，也因其抽、杀、削、吊、拉、搓、推、挡样样精通，而被誉为“八臂哪吒”。

在25届锦标赛中，他先是拉下3位欧洲大将，接着又淘汰欧、亚两颗明星：星野、别尔切克。半决赛中，遇上连挫中国强手的迈尔斯。打法刁钻的迈尔斯，起初以2：1领先。在大势将去的危急情势下，容国团不气馁，不手软，以大力推挡和多变的搓球，终于使迈尔斯节节败退。最后，在决赛中又碰上曾9次获得世界金牌的匈牙利老将西多，人们已为西多



准备好祝捷的鲜花。然而，容国团却奇迹般地连扳3局。中国体育史上具有历史意义的一页被容国团掀开了！西多在比赛结束后对记者说：“只有钢铁般的意志，才能经受住严峻的考验，容国团的胜利证实了这一点。”

这是多么恰如其分的评价。

#### ▲ 他过于珍惜自己的名声吗？

容国团这位叱咤风云，受人钦佩的人物突然被推入污泥浊水中，这使他极端苦闷无法解脱，只好以死消除苦闷。

他过于珍惜自己的名声吗？我们把时间推到1959年的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当他与西多激战3局拿下最后1分，斯德哥尔摩的威斯法伦大厅里掌声四起时，容国团却异常平静。他仿佛在向轻视中国的外国人宣告：为世界创造了灿烂文明的民族，也能拿世界冠军！两年后中国男队与日本队相逢，容国团在第8盘中迫使星野把最后一个球击出界外，从而结束中日决赛时，他再也抑制不住了！他扔掉了手中的球拍像个孩子似地在球场内为中国队第一次夺得世界团体冠军而欢跳。这是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他把集体的荣誉看得比个人的荣誉重要得多。

在他获得世界冠军后不久，他与队友郭仲恭去北京大华电影院看电影。当他出现在影院时有几位观众惊喜地指着他说：“容国团来了！”先是附近的观众把目光投向他，很快影院里的人都站起来看他，有的向他鼓掌致意，有的要求他讲话。他内心很激动但仍平静地坐着。放映的时间到了，影院的经理走过来对他说：“容国团同志，您不讲话电影无法放映。”郭仲恭也在一旁帮着经理求情：“你好歹讲几句吧。”但容国团真诚地回答：“我是个普通人，我不应在这个场合享受这种待遇。”他就是这样，把个人的名利、声望看得很轻很轻，他鄙视恃才傲物，从不以名流自居，也不爱挤到名流圈子里以示高雅。他喜欢结交普通人；在队里与一些名气不大的队员有着深厚的友谊，他与比他晚一辈的区盛联亲如兄弟。这种性格使他在恋爱问题上也与众不同，他获得世界冠军后，向他求爱的有各式各样的姑娘，他却异常慎重，选择了一位并不出名、相貌也不很出众的运动员黄秀珍，他相中了黄秀珍的贤惠、朴实和善良。他的眼光很准，当他撒手人寰，留下老父、女儿后，是黄秀珍以一种超人的坚毅，担起了沉重的政治与经济的双重压力。几年后黄秀珍再度组织家庭的时候，她要全家人都像亲生父母一样对待容国团的父亲，使老人的晚年过得舒适安逸。

如果他过于珍惜自己，也不会在1966年6月以后的非常年月里，表现出非常的气节。若想解脱自己，他可以随声附和地大骂“黑线”；他可以信誓旦旦地表示划清界限，甚至可以把已成为“黑标兵”的乒乓球队的所谓内幕揭露出来。他偏不！他宁肯冒着“粉身碎骨”的危险，写下肯定体育战线17年的建议书，即使忠骨毁灭，也决不出卖良心。

#### ▲ 无法平衡的心理

在中国乒乓球队里，容国团是最讲究用脑子打球的。他打球不如王传耀凶狠，也不如徐寅生多变，但他扬长避短，善于琢磨对手，使他率先跨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步。中国女队60年代初实力不如日本，他担任女队教练后，便针对日本队的状况制订了以柔克刚、出奇制胜的规划，他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当中国女队在南斯拉夫卢布尔雅那打翻身仗的前一天，足智多谋的容国团画了一条龙：以梁丽珍、李赫男的名字横贯龙身，而林慧卿、郑敏之的名字充当龙睛，喻意两块直拍一路攻克欧洲各队后，由两块横拍在最后决赛中制服日本队。他的这一杰作，指挥中国女队打了漂亮的翻身仗，第一次赢得女子团体冠军。

容国团是有思想有理智的人。他的学历并不高，但他好学，一本书、一杯茶常常能陪伴他度过一个假日。他精神世界追求的东西很丰富，知识面之宽广常令人吃惊。一次出国访问，他同一个意大利人交谈，他讲起意大利的民族英雄加里波第，讲到了他打仗时的战略战术，讲到了他的为人品质，这位意大利人听后感慨地说：“你比我这个意大利人更了解他。”原来，他在学习马克思、恩格斯的军事著作时，曾作过详细的笔记。他喜欢音乐，常常陶醉其中，一些年轻的运动员见他如醉如痴地听唱片的样子，曾感到奇怪。他会详细地讲述作品的内涵：《英雄》的激奋、《命运》的壮丽、《田园》的辽阔，逐渐使一些年轻运动员也跟他一样入了迷。他还爱踢足球、游泳、跳舞、书法、剪报，尤其喜欢看电影，他就是这样热爱生活。他有坚定的信念，有奋斗的目标，有充实的生活……而一旦这些东西全部破碎的时候，他的心理一下子失去了平衡。爱之越深，苦之越大。

容国团也是凡人，凡人总是有缺点的。“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他怀着满腔热情去参加。他崇敬毛泽东，深信他老人家的高瞻远瞩是不会把中国引向歧路的。尽管一些怪诞的现象每时每刻都在发生，许多让死人听了都会发笑的谬论充斥在每个角落，他仍想跟着运动去扭转思想，但正直的心又不能轻易就范。从感情上去接受自己接受不了的东西，这有多痛苦！生活中没有了目标——世界比赛不许参加了，甚至成了罪恶；生活中没有了乐趣——书籍、电影、音乐、美术几乎都成了罪恶的渊薮；生活中没有了友谊——朋友之间不能倾吐真情，人人要互相防范……最使他难受的是失去了人的尊严，一个好人可以随时被叫到台上批判、凌辱、殴打，动不动就可以抄家。乒乓球队成了名副其实的“运动队”，老领导荣高棠被打倒、游斗；他视为引路人的贺龙成了“大土匪”；从香港回来的傅其芳以及姜永宁，竟被逼得悬梁上吊，众多的优秀运动员进了单位私设的班房、拘留所。这一切事情太刺激他了，他曾为他的领导，他的战友落泪，然而他又无力扭转。

是男子汉就要抗争，“人生能有几次搏”，这是他以往为人的信条，如今，即使是鸡蛋碰石头，他也在所不惜。1968年5月初，他面对邪恶势力，受战友们的委托，执笔写下要求继续参加世界比赛的建议书，写下那个年代犯忌的“为祖国争取荣誉”的誓言。他希冀着党中央能理解他们的热血衷肠，他和战友们一起盼着、盼着……

5月12日，被称为《5·12通知》的中央文件下来了，它肯定了国家体委是所谓贺龙的独立王国，执行了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容国团听到这个消息，感到无比的震惊和痛心。苍天啊，你为什么这样不公平！

有《5·12通知》“指航向”，造反派更加有恃无恐，体育界被批斗的人越来越多。乒乓球队每次开会都有一连串的名字被点，一些教练员紧张到这种程度：每听到一个名字，都会下意识地动一下，他们随时准备被叫上台。容国团也被通知要揭发交代，他依然公正地评价他的战友：“他们是好人，是热爱毛主席的。”

自这一天起，容国团像变了一个人，他很少说话，眼神中总凄婉地若有所思。他感到已经走到了毫无指望的绝路——他发自内心地爱党爱国家，而自己又被认为是掉进了反革命的泥潭，被怀疑成颠覆祖国的特务。《5·12通知》是中央文件，中央的决定大概是万古不会更改的真理了！他更无法平衡过去的欢乐与今天的忧愁，过去的喜悦与今天的痛苦……

他离开了家，走到了体委训练局后面的龙潭湖畔。他在月夜下，一步步地徘徊。过去训练时，他常在这里跑步，今天他却感到无比的压抑，成荫的柳树像是压在头顶，微波不起的湖水像深不见底的黑洞，凝聚着数不尽的哀愁，周围像死一般的寂静……

晚上9时，黄秀珍看丈夫还没有回家，便到乒乓球队找他。队友们告诉她，容国团并没有来。11点多钟，容国团仍旧没有回家。黄秀珍预感到事态不妙，她找到几位朋友，商量如何去寻找容国团。郭仲恭焦急地说：“他思绪肯定很乱，我们必须到龙潭湖大声呼唤他的名字，让他在喊声中惊醒。”

“容国团！容国团！……”几个人不停地喊叫着，湖畔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回音。

凌晨4点半钟，体委接到派出所的电话，通知他们在离龙潭湖几里远的养鸭房旁，发现了一具悬挂的尸体，可能是容国团。整个体委都震惊了。一代球星，竟落得这样悲惨的结局！

大家赶到吊着容国团的槐树下，默默地看着他那清瘦的遗体，人们能说什么呢？心里淌着悲伤的泪。可以想见，容国团从晚饭后到凌晨两点半，一直在这一带不停地走，生与死的搏斗，不停息地在他脑海里翻滚，最后终于让死的念头占了上风。

郭仲恭走到树下，去解容国团脖子上的尼龙绳。这个扣子系得又清楚又结实，最后不得不用刀子割开。容国团向来做事精细、周密，留给人世间最后一件“作品”，也展示着他的性格。遗体被放在地上，他的头上和身上被蒙上了白布，一双穿白球鞋的脚露在外面。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当他们听到这是容国团时，几乎无一例外地叹息：“哎……天哪……”

他没有白白地死去，他留下了浩气长存的精神，留下了血淋淋的控诉，留下了对“文化大革命”的罪恶记录。

一直在与林彪、“四人帮”进行斗争的周恩来总理愤怒了，他再一次向极“左”势力发出警告：对有名的运动员、教练员不允许批斗关押！

几天以后，一批著名运动员、教练员被释放了。从某种程度上说，容国团一个人的死，换来了众多战友的生。

总理的指示，使有关部门不得不重视。经详细调查容国团的死因，他的遗体在几天后才火化。极“左”势力那时也是强大的，他们居然在容国团死后到他家里进行了一次抄家洗劫，对死去的和活着的都不饶恕。

人们屈指一算，容国团死时恰好30岁，离他拿世界冠军的日子仅仅9年……

□ 原载于《春秋》1998年第6期，作者金汕，此处略有删节。

~~~~~

## 【往事非烟】

父亲让我去问江青

• 张美音 •

(一)

1967年5月11日，我的父亲张艾丁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了，这一关押就是整整8年时间。父亲的“罪名”是：反军，反江青，反中央文革。抓捕父亲的命令，是江青亲笔署名签发的。

我有一个哥哥，两个弟弟，在家里我是深得父亲宠爱和信任的女儿。就在父亲被抓的前几天，1967年的5月初，也许是预感到了大难临头，父亲与我有过一次铭心刻骨的谈话。

那天父亲对我说，“（单位的大字报和批斗会）我被扣上反江青的罪名，可能会被抓。但这绝对是冤枉的！我为什么要反江青？！我是被人陷害的！假如我被抓起来，你要照顾好妈妈和小丁（小弟小学二年级）”。我含泪点点头，不敢抬眼看父亲，父亲的声音哽咽着，想必是落泪了。

曾经父亲的形象在我心中是何等高大伟岸！他是京剧《杜鹃山》的编剧兼导演，《杜鹃山》是1964年全国现代戏汇演轰动一时的参演剧目。父亲生于1910年，祖籍安徽桐城，大学毕业后在中学教国文。抗日战争一爆发，他就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戏剧运动中，他对戏剧的热爱，从中学时代演文明戏开始，文明戏是中国话剧的雏形，也是早期的京剧改革。文明戏与中国传统戏曲的区别在于以“对话”为主要表现手段，“唱段”还部分存在，但表演和唱腔已经不再程式化。戏剧救亡，是青年父亲的革命理想。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革命军三十二军的军长商震将军，有个三十二军话剧团，父亲曾为团长，开展救亡歌曲和救亡演剧活动。1949年父亲从华北文工团转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研究员、研究室副主任，1958年调入北京京剧团。虽然他先后导演了马连良、谭富英、裘盛戎主演的《三顾茅庐》，导演了张君秋主演的《诗文会》和赵燕侠主演的《白蛇传》、《红梅阁》，但是作为一个民国培养的洋派大学生，一个抗日烽火中的资深话剧人，父亲是在江青之前，就力主京剧改革的。

文革开始，父亲的工作单位，北京京剧一团工作组由李英儒负责，李是军队作家，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的作者。李英儒说他的工作组是江青指派的，京剧团的一些人因为对李英儒的工作提意见，就被扣上“反军”的帽子，反李英儒，就是反江青，反江青，就是反中央文革。父亲本人没有任何直接或间接针对李英儒的言论，却被诬陷成“黑后台”，遭到逮捕，关押8年。后来狗咬狗，李英儒也被咬下去了。

父亲是党外的戏剧工作者，从1964年全国现代戏汇演到1966年文革前，父亲完全不知江青涉足文艺界，更不知道江青还有什么文艺革命的主张。只是为了他自己的京剧改革理念，父亲在媒体上公开参与论战，发表了倡导京剧学习话剧的文章，论战的对立面特别指出父亲的话剧出身，指责父亲所谓京剧现代戏改革就是“话剧加唱”。直到《北京日报》发表社论点名批父亲，他才觉出大事不好，激流勇退。文革开始后，父亲方知自己当初参与的论战，背景是彭真领导下的北京市与江青的暗斗（后传言江青赞赏过父亲“话剧加唱”的主张），争论的实质并不是京剧现代戏改革的学术分歧，而是你死我活的政治权斗。

父亲对我说他“不反江青”，指的就是他从1960年代初开始，就是京剧现代戏的坚定的改革派，他编导的《杜鹃山》与江青的现代戏主张非但不冲突，还可以说不谋而合，怎么能给他扣上“反江青”的帽子呢？

听到这里，我告诉父亲，前几天，学校有同学说，他们偶然经过人民大会堂，看到大门敞开，有许多学生出出进进，就跟着进到了会议厅。居然看到江青正在那里接见红卫

兵！……我对父亲说，“如果还能有这样的机会，我也混进去，当面问问江青，你哪里反她了？”现在想来我真是太幼稚、太天真了，当时我是一个初二的女孩。

没想到爸爸听了却非常激动！他认真地对我说：“对！你一定要当面问问江青！我究竟哪里反她了？”……

几天后父亲失踪了。没有任何人来通知我家是什么情况，母亲找到剧团去问，剧团说让我们等公安局方面的消息，但没有任何消息。几个星期之后我们才收到一封信，是父亲的笔迹。当时我的最大感觉就是“父亲还活着！”……信的内容是他需要一些生活用品，在指定时间送到半步桥监狱。

我牢记着自己答应过父亲，要设法溜进人民大会堂，当面去问江青。从此我总在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西侧的马路边游逛，从早到晚，盼着能有那样一个机会进入，替父亲去问问江青。那些日子我每天寝食难安，人变得又黑又瘦，夜里睡不着觉。需要吃安眠药，超量一次吃到五六片，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但我却始终没有寻到机会完成父亲入狱前的这个嘱托，直到我离开北京去内蒙古农村插队，都没能想办法进到人民大会堂里面去问江青。……

## （二）

1968年我随学校同学下乡到了内蒙古武川县。爸爸被关了8年，我在内蒙古农村插队也是整整8年。这8年里，我从知青变成了一个真正受苦受累的农民。

春天大地刚一化冻，就开始播种小麦、莜麦，牛拉着木制的耩，我在这个季节干的是帮耩、打拉洞、抓粪，这几样活儿我觉得抓粪是最苦重的，筐箩用绳子套在脖子上，深一脚浅一脚在松软的地里追着牛拉的耩，手不间断地抓筐箩里的粪往地里撒，又脏又臭又累还生怕追不上前面牵牛耩地人的速度；地种完，队里安排做泥水，后山人住的房子都是土坯盖的，过了冬天，必须在房顶贴上一层新泥防雨季漏雨，这个活儿，我主动申请挑水；接着是夏天锄地；最恐怖的是秋收，远近山丘望不到边的金黄庄稼，都等着我们用双手放倒，知青很少有谁能像老乡那样利索的，总是连滚带爬、咬牙切齿的一天天坚持着，手上满是血泡，收工时手套粘在皮上脱不掉，割莜麦用镰刀，对于有腰病的我来说，到了地头根本直不起腰来；我们知青还包下了场面上往脱谷机里搗麦子的活儿，戴着风镜、纱巾、口罩、手套，一个个打扮得如同妖魔鬼怪，仍旧免不了衣服里面（包括脖子、裤腰、甚至耳朵眼儿里）满是麦芒和细尘，眼睛刺的红红的如同害了眼病，这在农村本不是女人干的活儿，可是我们女知青还抢着干。

因为缺吃少穿，有些知青还依靠着北京的父母，要这要那，或者长期呆在北京的家里混吃混喝不回农村。我却是努力于不给母亲再增加负担，生活不但要自给自足，每到农闲回北京，还要大包小裹背回家各种短缺的食物：鸡蛋、豆子、成袋的面粉，一扇羊肉或是半扇猪肉。我记着父亲进监狱前的嘱托：照顾好你的妈妈！照顾好弟弟小丁！

几年后武川县的一些村子兴起了女知青嫁给农民的风潮，结婚至少可以逃避繁重的体力劳动，当地风俗是女人结了婚就不用下地干活儿了，只在家里做做饭，吃喝也比当知青要富足些。我们村里11个知青，就有5个嫁给了老乡。我们同住一屋的也是5个女同学，面对提婚、诱婚，我的态度是坚决抵制。在我的带领和保护下，我们5个女知青都没嫁农民。

为此村里也打击排斥过我。后来老乡们慢慢认可了我的吃苦和能干，还选我当了妇女队长。我成了村里有话语权的人物。1975年老乡联名推荐我上大学，在一张纸上，几十个人按了红手印。

可是父亲还在狱中，被“拘留审查”。来武川招生的北京师范大学的老师，听了有关的介绍，看了我的档案，觉得因为父亲的问题尚未结论（如果定性了，当时政策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也有可能上大学），就不明不白失去这个改变命运的机会，有些可惜了。所以，大学招生的老师为了我的上学之事，破例到北京市公安局进行了外调。

北京市公安局专案组的杜好先、张国钧告诉招生的老师，张艾丁的问题已经清楚，没有查出什么问题，专案组曾经前后3次与北京京剧一团（文革时的“样板团”都被江青编入中央军委系统）的领导联系，希望以剧团的名义出具公函，接出张艾丁，可是剧团表示拒绝。

好心的招生老师又亲自来到北京我的家里，找到我母亲，将他们从公安局了解到的情况告知，正逢在青海工作的哥哥张海燕到北京出差，家人这才得知了我们自己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得知的内情。北师大招生的老师还帮助出主意说，“借此，你们不妨去找剧团领导恳求一下，如果能接出张艾丁，不仅对他精神和身体的健康恢复有好处，还可以一并解决女儿张美音上大学的问题。”

第二天，我哥哥张海燕与我姑姑林薇去见父亲单位的党委书记薛恩厚（进入“三结合”领导班子，江青给他改名“薛今后”），哥哥和姑姑在晚上找到薛的家里说明情况：公安局已查明张艾丁没有什么问题，且老人年过花甲，体弱多病，希望单位领导无论如何能将其接出来。可是薛从头至尾一言不发，当哥哥和姑姑无比失望、无奈，打算离开薛家时，他才挥了下手，说了3个字：“朝前看”。

“朝前看”，看什么呢？真是“阎王好办，小鬼难缠”。

我还是在农村，上不了大学；父亲还是查无实罪却被无辜关押着。为什么公安局三次主动联系父亲单位要他们出具公函接我父亲出狱，却屡遭拒绝？原来，京剧团有人放话说，张艾丁被捕入狱的事情是江青同志亲自过问的，拘捕令是江青同志亲自签发的，此案是铁案，没有翻案的可能。鉴于江青的身份地位，也没人敢趟这浑水，没人敢接他出来。……

我一直觉得高高在上的江青离我父亲和我的家远着哪。怎么都没有想到，江青亲手签署拘捕令抓的第一个人，竟然就是我的父亲！

### （三）

我与从兆桓老先生约了一年，终于在2002年2月17日见面。这时距离父亲1987年去世已经过了15年。从先生送给我一本书，《从兆桓评传》，作者陈均。这本书讲述了从先生作为昆曲大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多彩人生。从先生早年演出的很多剧目我小时候都看过，他是昆曲舞台上风流倜傥的小生，《牡丹亭》里的柳梦梅、《李慧娘》中的裴生。

《从兆桓评传》这本书最吸引我的，还是从先生在狱中的8年。泣血的描述让我联想到父亲在狱中的情形。从先生文革期间的牢狱8年，是与我的父亲张艾丁同样的罪名，关在同一所监狱。在他们的关押期间，我们两家亲属经常悄悄联络，相互打探消息，相帮互扶度过了那艰难的8年。我还记得当时从先生的夫人秦肖玉带着幼小的女儿丛珊（主演《牧马人》

获得电影百花奖）到我家的情形，丛夫人和母亲都不敢大声讲话，她俩悄悄低语，小丛珊默默地坐在一边。

父亲被释放的时候，四人帮还在台上，大概出狱时父亲受到过警告、恐吓，关于他8年狱中生活的情形，他在家只字不提，我们子女，包括我母亲都毫不知情。所以阅读这本书是我了解父亲狱中生活的唯一途径。

关于监狱生活，书中这样写我父亲：跟我一起关进来的老头，编剧张艾丁，他也是曾经一度皮包骨头了。腿很细很细，连“放茅”去厕所时都走不动，要人搀着。不然要在地爬了。这时我就写个小条子给他：“无论如何要坚持活着出去，老先生，无论如何要坚持活着出去”。最后他坚持出来了。

读到这里我已是泪流满面，无法自持。呜呼！我可怜的爸爸！

《丛兆桓评传》第六十五节写到，1967年5月11日，上午九点多钟，北京市公安局没有宣布任何罪名，只说，奉上级指示，铐起来！然后就手铐起来上汽车，也不知到哪里去，后来知道预审处在半步桥。……与丛兆桓同时被捕的还有北京京剧团的编剧、导演张艾丁，时已年过六十，被诬为“少数派”之“黑后台”而打成“三反分子”。《狱中诗》有20余首，其诗云：

多少恨，昨夜梦魂中：还似旧时游闹市，擎妇将雏任西东，愉快又轻松。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今已过六十余，风前残烛自易熄，瓦上微霜日上时。  
生何欢兮死何惧？晚节未保悔恨迟。瘐死狱中难瞑目，千古余恨永无期。

丛先生在监狱里的时候，伺候过4个疯子，用席子卷出去6具尸体，对此作者陈均先生评道：“听丛先生讲述狱中故事，最平淡之语莫过于此”。而我想到的是，我爸爸真是九死一生啊！

《丛兆桓评传》之七十二，1970年备战，丛先生与同监在押人员（包括我父亲张艾丁、北京人艺的演员英若诚，后来知道还有中学生周七月等）被全副武装的公安干警从北京解押到山西省阳城县。到了山西，不但吃不上北京的窝窝头，也吃不上临汾的坨子，完全吃稀饭，一顿两碗，高粱面做的糊糊（不是很稠的那种临汾那边能够捧起来吃的）。这个稀到什么程度？稀到能够照见脸。水一样的，这样一顿两碗就吃不饱。他们说遭灾了，只能吃稀的。年轻人为了吃饱点或多吃一口，就打架，也有欺负老实人的，“你吃不了给我”去抢一口。小伙子为了吃饱饭，伺机到后院里（比如去放东西）偷吃猪食，部队喂的猪。大锅里熬的猪食，倒上点解放军吃剩的饭菜。一旦被发现，就挨揍。这里又引了我父亲张艾丁的《狱中诗》：

监狱生活何所求，一日专盼三碗粥，室内粪便呈异味，桶中饭菜胜珍馐。  
筷头碗底俱舔尽，颗粒无存尽入喉。可怜洗碗刷锅水，小猪见了泪双流！  
监狱生活费思量，颠三倒四难猜详，青年俱患胃亏养，老人肠胃反正常。

丛先生8年后终被释放，监狱干部对他说，“在我们这儿8年，吃了我们的饭，得给我们缴伙食费”。多少钱？“一天两毛二，一个月六块六，等补发你8年的工资后，来这儿主动缴纳齐，之后的一切与我们不再相关。”

我想起父亲被抓进去后，粮食关系还在家里，每个月都有一份父亲的粮油票，家里人稀里糊涂就吃掉了。一年后突然接到通知要销掉父亲的粮食关系，还要追讨他的粮票油票。吓坏了我母亲。于是发动所有亲戚，包括姑姑、叔叔、二姨、三姨，帮我们家凑粮票，凑足换成全国通用的赶快缴上去。

那种时候谁不胆战心惊？比起被处决，比起被索要“子弹费”的亲属，我家的遭遇，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 （四）

父亲1967年被捕，1975年释放回家，到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4月4日，在文化部召开的万人大会上，才正式平反。1978年6月，我哥哥张海燕投稿《人民日报》：《寻访杜好先、张国钧两位恩人》，内容是感谢北京市公安局张艾丁专案组的这两位工作人员，既是表达感谢也是寻人启事。哥哥的文章先登在《人民日报》内参上，后经有关领导批示，加上编者按，以读者来信的形式，发表在《人民日报》8月16日第四版头条。

张海燕文革时是天津大学化工系化学工程专业的一名在校大学生。他为了营救父亲，从1967年在校时期开始，到1970年8月被分配到青海西宁的一家机械工厂8年，再调到天津化纤厂和天津大学，最后截止到父亲1978年4月4日正式平反，在这长达11年的时间里，哥哥先后用邮寄，还利用探亲 and 出差到北京的机会上访北京市政府和中央有关部门接待站，投书百余封！为父亲鸣冤。

这些信件大都被批转到关押父亲的北京市公安局处理（一小部分被转到哥哥的单位）。父亲释放回到家，曾经告诉哥哥，北京市公安局父亲专案组的杜好先、张国钧两位办案人员，借审讯之机，给父亲读转到北京市公安局的哥哥的上诉信件。父亲依此得知妈妈和我们兄弟姐妹都好，父亲当场哭了！从而更坚定了要活着出狱的决心。

1973年春节，哥哥未婚妻的父亲患胃癌晚期已扩散，未来的岳父希望能在有生之年见到老闺女（未婚妻在其兄弟姊妹中最小）成亲，于是哥哥决定结婚。他写信给北京市公安局，作为张艾丁的长子，希望能让他和未婚妻以及自己的妈妈、兄弟姐妹与尚在关押中的父亲见上一面。

几乎所有亲友都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甚至还有亲戚出面阻止，怕这样瞎折腾会再度连累到他们。但是，在杜好先、张国钧两位办案人员的支持和帮助下，我们全家人终于见到了被关押的父亲，我永远忘不了这次见面。哥哥和未婚妻把这次见面当成婚礼，他俩再没有举行任何形式的婚礼，甚至也没拍结婚照。哥哥的岳父在哥嫂结婚几个月后的1973年夏天，与世长辞。

直到我们与父亲见面一年后的1974年春天，父亲还没有被释放。于是哥哥张海燕继续上诉，上诉信被批转到北京市公安局后，专案组杜好先、张国钧马上给我妈妈打电话，说关于释放我父亲的问题，“你们想到的我们都想到了，你们没有想到的，我们也替你们想到了。我们办不到的，你们也办不到。请你转告你的孩子不要再写信了”。话语中句句充满关爱之情，我妈妈把他们的话转告给远在青海的哥嫂，也告诉了我们其他的兄弟姐妹们，温暖了全家人心。

杜好先和张国钧几次去父亲的工作单位北京京剧一团（即今天的北京京剧院）要他们接出父亲而遭拒，他俩同时也不放弃其他的尝试和努力，最终依据当时出台的政策将父亲办成



“保外就医”出狱。在父亲人出狱而身份未得到正式平反这段时间，杜、张二人多次来我家看望养病的父亲。但是从万人大会为父亲等人正式平反那一天起，我的父母和全家人就再也见不到他们二位的踪影。因此，父母在生前都曾对我们子女交代说，很遗憾未能亲口向杜、张二同志说声“谢谢”，希望我们有机会时，要当面向他们表达感谢之意。

虽然哥哥1978年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寻人启事”，但是时至今日，苦苦寻找，却杳无音讯。弟弟到北京市公安系统层层问询，连老干部局都不遗漏，结果全部是“查无此人”。有同学被我们坚持不懈的诚意所感染，通过人名搜索在全国查到好几个“杜好先”，经过仔细筛选比对，认为山东省高密县的“杜好先”似乎最接近，紧接着我寄出挂号信，却被当地邮局贴了3个“查无此人”的条子退回。我再打长途电话到当地派出所核对细节，将原地址更改为“山东省高密市密水街道南关新一村”，再次发信，仍然被退回。这两个人，就像人间蒸发了似的，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也难以完成父母的遗愿。——杜好先，张国钧，当年父亲的办案人员，如今你们可安好？

（写于2017年3月）

□ 来源：《熊窝》网站

~~~~~

# 【一家之言】

戚本禹谈毛泽东

• 孟祥才 • 戚本禹 •

（孟祥才，山东大学教授，1964年作为研究生考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所。文革中，孟祥才是历史所造反派核心成员之一。本采访发生于2013年。——编注）

孟祥才（以下简称孟）：戚先生，您与毛主席有着极其深切的情缘，真可以说是“剪不断，理还乱”！今年12月26日是他老人家的120岁诞辰纪念日，您肯定有许多想法，许多感慨，愿意谈谈吗？

戚本禹（以下简称戚）：我与毛主席的确有很深的情缘。我1950年4月从中央团校培训班结业，进入中央办公厅工作，开始做图书管理员，以后做科长、处长。1964年4月任《红旗》杂志历史组组长。文化大革命中曾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兼任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办公厅副主任、常务副主任、代主任，一时看起来“风光无限”。18年后的1968年1月20日以“反革命”罪被捕，投入秦城监狱，度过了18年的刑期。毛主席曾经给我许多难以忘怀的教诲，也曾一句话将我送进监狱。真是成也毛主席，败也毛主席！两个18年啊！有人认为我应该加入激烈批判他的行列，一吐胸中之怨气，但我却没有这样做，因为我不太看重个人恩怨，而是比较看重从历史学家角度出发的理性思考。再说，毛主席尽管将我投入监狱，但没有将我交给群众组织，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保护了我。你想，如果当时将我交给我批判和反对过的群众组织，我还有活路吗？

孟：我很赞同您的态度。那么，您从总体上如何评价毛主席呢？

戚：现在，记述和评论毛主席的著作，在中国，在全世界，可称得上“积案盈箱”、“汗牛充栋”了！我只讲四点。第一，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他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功绩无人能望其项背：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是他领导中国人民洗雪了百年耻辱，使中华民族重

新挺直腰杆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第二，他对共产主义信仰的坚定和执着无一人能够比拟；第三，截至目前，他的政治、军事才干，理论素养、文化修养，在中国共产党的几代领导人中可谓领袖群伦，无人堪比；第四，在探索如何走向共产主义的路径上，他的气魄、勇毅，真可谓古之所无，今之少有。如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动作，除了毛主席，谁还敢干？这里，我想起梁启超的一首诗：

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肯为百世师。誓起民权与大同，更研真理熔新知。  
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如狂欲谁语。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

梁启超“既开风气又为师”的气魄可谓大矣，但同毛主席的“粪土当年万户侯”、“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以及“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的气势、雄豪相比，不就高下立判了吗？

孟：说到文化大革命，这是毛主席最为人们所诟病的问题，您是同文化大革命关系最密切的当事人之一，文革中勃发，文革中落难。现在文革已经尘埃落定近半个世纪，社会上对文革的评论却依然是聚讼纷纭。您今天怎么评价文革呢？

戚：我认为文革是最能彰显毛主席冲天气魄和弥天大勇的事件。他最早发现执政党的各级领导走向腐败，即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危险，最早提出解放后的中国存在“官僚资产阶级”，存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于是在自己生命的最后10年毅然发动文革，希望以此阻断中国走向资本主义的势头。他特别看重文革，认为是自己一生所做的最重要的两件大事之一，但也知道此事“赞成的人少，反对的人多”，所以直到临终前还要求邓小平领衔对文革作一个“三七开”，即基本肯定的总结。评价文革不是一句话能够说清楚的，但有一点可以说，文革至少使中国今日老百姓人人深恶痛绝的腐败之风推迟10年蔓延！

孟：但是，文革是中国共产党的决议彻底否定、被主流意识形态定为“浩劫”的呀？

戚：文革的确有不少负面的东西。因为它“史无前例”，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胆、最冒险、最激动人心的探索。不必讳言，由于种种原因，即可以避免和不可避免的许多失误，开始轰轰烈烈的文革最终还是失败了。尽管如此，但我认为，还是不能“彻底否定”文革，作为革命道路的探索，它有其成功的方面，如通过群众运动揭露执政党的阴暗面，发动群众监督党和政府的工作。再如大字报，它是群众民主表达自己意愿的一种相当成功和有效的形式，应该成为与腐败斗争的有力武器，有些像现在的“互联网”吧？一些有问题的干部很怕它。当然，文革更留下许多深刻的教训，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更重要的财富。今天，文革已经成为历史学家面对的学术问题，虽然大多数年轻人不知文革为何物，但学术界对它的研究将会持续下去，而且有一点我坚信不疑：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文革的评价会越来越公正客观，文革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怀念。

孟：文革是在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在一定意义上，不可不说，文革是这个理论的一次并不成功的实践，您怎样评价这个理论？

戚：不管现在人们怎样评价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我认为这个理论是毛主席的伟大创造，不仅是毛泽东思想宝库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更是最具创新价值的组成部分。这个理论的核心是探索在无产阶级掌权以后如何保持执政党的纯洁性，保持执政党与人民大众的血肉联系，保证历史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使日益增长的社会财富不偏离为人民大众谋福利的轨道。这个理论似可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毛主席认为，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开始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还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个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在这个过渡时期，必须坚持和强化无产阶级专政。

第二，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党内集中表现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最大的危险是党内出现坚持修正主义路线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一旦掌权，就会改变党的正确路线，改变社会主义方向，强行挟持党和国家走资本主义道路。所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主要对象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毛主席对这批人的一个科学概括，非常精准。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只要这部分人窃取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社会主义转向资本主义只是时间问题。

第三，进行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最有效的方式，是文化大革命，因为这种方式能够将广大革命群众发动起来，利用“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形式不断揭露党、政府和社会的阴暗面，不断清除腐败，使走资派无处藏身，使腐败在造成大的危害前即被揭露和整肃，极其有利于保持党和革命队伍的纯洁性。因为腐败不断产生，就需要不断揭露和铲除，所以毛主席说，文化大革命要“七八年再来一次”。

第四，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不断壮大和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同时严格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用制度将贫富差距控制在劳动人民能够接受的范围内，真正使全国人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第五，不断改造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对行政体制、文化教育、卫生医疗、科学研究等领域进行改革和改造，使全民都能享受民主权利和文化教育、卫生医疗服务。等等。

这些理论显然是正确的，或基本是正确的。不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and 实践，走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国家是很容易回归资本主义道路的，“苏东巨变”就是摆在眼前的活生生的例子。前苏联的部长会议主席尼·伊·雷日科夫写的《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记述了前苏联这个革命成功70多年的社会主义国家走向崩溃的悲剧历程，使我们看到走资派如何与国际敌对势力相勾结，将一个曾经强大的、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社会主义大国轻而易举地扭回了资本主义道路，很值得一读。昔日敢于同美国和整个西方叫板的苏联一朝瓦解，今日的俄罗斯在美国操纵的北约不断东扩威势的步步进逼下，一让再让，屈辱求和，看着就令人憋气。

顺便说一下。有人，就是邓小平，提出“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要点有二：一是将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排除在毛泽东思想之外，意思是将所有他认为不符合自己标准的毛泽东思想的内容统统排除在毛泽东思想之外，这实在是匪夷所思！所谓毛泽东思想就是他的全部思想，无论正确和错误的内容都应该包括在内，否则何来“完整”？何来“准确”？再说，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排除出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还成其为毛泽东思想吗？二是说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创造，这更令人匪夷所思！因为全党全国人民创造的思想丰富极了，如果全党全国人民创造的思想都算毛泽东思想，那么，毛泽东思想还有边际吗？在我看来，毛泽东思想就是毛主席个人创造的思想，带有鲜明的时代和个性特征。当然，毛泽东思想是他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的总结和理论升华，这里面自然包括对广大群众创造的理论 and 经验的总结，但这种总结和理论升华并不是任

何一个人都能做得出来的，毛主席做出来了，这就打上他个人的印记和特点，也就只能是毛泽东的思想。所以其他任何人创造的思想都不能归于毛泽东思想之中。

孟：可是，文革的破坏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也是直到现在文革依然为许多人所诟病的原因吧？

戚：文革中的“破四旧”的确破坏了不少文物古迹，烧掉了一些珍贵的书籍、字画和文物古玩等，还错杀了一些地、富、反、坏、右等所谓敌对分子，实在令人痛心。但这些破坏一股脑儿算在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头上却是不公平的。

事实是，文革中破坏最严重的1967年6、7、8三个月，正是“资反路线”最猖獗的三个月，北京最早的那批“红卫兵”，以“联动”、“西纠”为首，高喊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杀向社会，在他们掌握重权的老子明里暗里支持下，打、砸、抢、抓、抄、烧、杀，无所不用其极，犯下一连串令人发指的罪行。但这与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几乎没有关系，而是在“资反路线”纵容下进行的。毛泽东所以给这次革命起名叫文化大革命，就是指要用文化的方式、批判的方式、非暴力的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他虽然提出过“全面内战”的口号，但也是指用“文斗”的方式进行阶级斗争。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的任何人都没有提倡“武斗”，江青是讲过“文攻武卫”的话，她要求造反派“文攻”，但当走资派，特别是军队以武力对付造反派时，才要求“武卫”。而打、砸、抢、抓、抄、杀的主力，恰恰是首都工作组（叶剑英实际负责）支持的以高干子弟组成的红卫兵“联动”、“西纠”之类组织。组织斗争罗瑞卿的不是解放军吗？抓彭真的所谓红卫兵不是叶帅调动的特种兵吗？特别应该指出，“联动”、“西纠”之类组织的暴行，还是在毛主席8月回京后，经中央文革小组汇报后下令制止的。有些地方，如杭州的红卫兵要砸灵隐寺，当地党政领导谁说也不听，不是陈伯达打电话制止的吗？就说你们历史所当年到造纸厂抢救善本书，不也是在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下做的吗？

可是，现在将文革中出现的一切破坏活动统统算在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的账上，这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文革结束后，当年打、砸、抢、抓、抄、烧、杀的英雄们不仅没有人出来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忏悔，还原历史真相，反而以文革受害者的面貌出来控诉文革，这样的无耻行径不令人齿冷吗？再说对刘少奇、陶铸等人的批斗，硬说完全是由我策划的，还说搞了武斗，这都不符合事实。你想，我当时的身份地位，能自行决定批斗刘少奇、陶铸这样的大人物吗？我只能奉命行事。让他们的夫人陪斗，是陈伯达的指示，开会时，是我决定让陶铸夫人曾志坐着，因为我知道她与毛主席的关系不错。批斗会全程录影，绝对没有武斗，是文革中最文明的批斗会。不信你放录影看看？

孟：然而，文革的结果却是“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几亿中国人民生活在贫困中，这与毛主席的初衷不是相背离的吗？

戚：“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是一个很有煽惑力的提法，实际上是言过其实的。你看文革中多次发布的国民经济发展的年度报告，工农业基本上不都是连年增产吗？当然，由于毛主席对文革的作用作了过于乐观的估计，没有预见到问题的复杂性，对于生产的关注度不够，导致生产力的进步迟缓，经济发展的速度不够理想，对外的开放度也很不够，文化教育科学领域批判过头等，这与毛主席理想的人民的革命积极性一旦激发出来就会出现经济的飞跃发展显然是不相符的。这些缺点和失误，有的可以避免，有的难以避免，这在如此“史无前例”的文革中出现是可以理解的。

孟：文革结束后不久，社会上就出现全盘否定毛主席的一股歪风，国外和港、台还出现了一些诸如李志绥编撰的那样在私生活上抹黑毛主席的书，您如何看待这些现象？

戚：中国国内出现的全盘否定毛主席的歪风，在我看来是主要一小撮右派势力所为，跟着他们跑的群体情况比较复杂，其中大多数是不明真相，稀里糊涂，少数是哗众取宠，起哄凑热闹。在国外，则是一批唯恐中国不乱的敌对势力兴风作浪。

至于李志绥，他那本书纯粹是一派胡言。这个人我认识，他曾在中南海做过保健医生，我也找他看过病。他在书中吹嘘自己怎样参加党的重要会议，如何同毛主席私下交谈一些重要问题等，绝对都是信口胡编的。中央举行的一些会议，如政治局常委会议、政治局会议、中央委员会会议，什么人参加都有严格规定，做会议记录的工作人员都是严格挑选的，无关人员是绝对禁止涉足会场的。李志绥一个小小的医生，根本不可能涉足这类会议。至于他说自己多次同毛主席私下交谈一些重要问题，更是无稽之谈。你想，毛主席日理万机，什么问题应该找谁谈，都是有特定的目标，他怎么会找李志绥这样八杆子打不着的人谈党内机密和国家大事？再说，毛主席根本也没有时间找李志绥这样的人扯闲篇！还有李志绥写的那些所谓揭露毛主席的私生活的活灵活现的故事，完全是无耻的虚意编造。毛主席虽贵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但他却没有个人的自由，他天天生活在秘书、警卫战士和其他工作人员的注视下。不说别的，警卫战士一天24小时都在他的卧室门口站岗。他可能背着这些人干那些龌龊事吗？更重要的是，毛主席是中国人民心目中最伟大的领袖，他必须树立自己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崇高的道德形象，他不可能自毁形象。李志绥的编造，只能骗那些没有在毛主席身边工作过的人。

当然，这并不是说毛主席没有缺点错误。他的性格有点偏执，自以为是，偏听偏信，主观武断，做了一些错误的决定，伤害了一些不该伤害的人。但是，他一旦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就承认，就改正，毛主席的缺点错误，犹如子贡所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

孟：您曾近距离地接触毛主席，他留在您心中的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

戚：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了18年，几乎天天能够看到他，我最深刻的印象有这样几点：

一是他忘我的工作精神。他每天要处理的世界大事、国家大事一个接一个，不停地开会、批阅档，夜以继日，很少有休息的时候。如抗美援朝的日日夜夜，他时刻关注着战况的发展变化，不断做出决策，发出电报，指导中朝军民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硬是将世界上军事力量最强大的美国逼到谈判桌前。

二是对劳动人民那份发自内心的血肉亲情。他期望中国人民尽快摆脱贫困，为此他领导了史无前例的土改、合作化、工商业的公私合营、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等。三年困难时期，面对群众遭受的苦难，他流泪自责，拒绝吃肉。1958年，他带头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主动将自己的工资由一级降为三级。世界上有这样的无产阶级领袖吗？

三是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信和执着。可以说，建国后的27年，毛主席做的所有工作，都可以归结为对中国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最终目标的探索。在他生命的最后10年，毅然发动文化大革命，目的更是“反修防修”，保证中国不偏离社会主义道路。

四是他的读书学习精神。毛主席平时除了工作就是读书学习。你去他的住地看看，无论是办公室、书房还是卧室，甚至卫生间，映入眼帘的主要是书。他老人家读书之勤，读书之

多，读书之快，读书之富有成效，在几代领导人中无人能比！他是为革命而读书，为总结中国和世界革命的经验教训而读书。他总能从读书中找出为我所用的东西，指导革命和建设工

作。

五是他的智慧、才能、眼界绝对超越他同辈的一切领袖人物。他的视野特别开阔，思索特别深邃，遇事总能比别人站得高，看得远。他想问题，办事情，总是不忘过去，重视现在，展望未来。比如，他赞赏孔子的“入太庙，每事问”，一直强调对什么事情都要“每事问”。读中国古书，他总是联系现在，古人那么办，我们怎么办？如读至《资治通鉴》这一段：

上曰：“为朕养民者，唯在都督、刺史，朕常疏其名于屏风，坐卧观之，得其在官善恶之迹，皆注于名下，以备黜陟。县令又为亲民，不可不择。”乃命内外五品已上，各举堪为县令者，以名闻。（《通鉴》卷193《唐纪》9·太宗贞观二年）

毛主席就问：我们现在怎么鉴别和使用干部？

再如读到马列著作的某个观点，他也总是对照马列，问中国怎么办，我们怎么办？他对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和斯大林的“一切以条件、地点和时间转移”两段话特别重视，多次强调其重要意义。他认为所谓分析，就是搞清楚时间、地点、条件，而条件中最重要的是人的条件，在人的条件中特别要分清阶级和阶级力量对比，哪些人拥护党的政策？哪些人反对党的政策？那里领导者的情况如何？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等人的品格和能力如何？一个新政策的出台，就是调整各方面的关系，要分清利弊，利大还是弊大？特别要看是否对大多数群众有利？毛主席的每次谈话，几乎都有发人深省的东西，引导人们进行深入的思考。

在毛主席同辈的领袖人物中，刘少奇谈党务，陈云谈经济，都能提出一些发人深省、引人思考的东西。周总理注重具体事务多，他很少能提出一些发人深省、引人思考的东西。毛主席始终怀抱高远的理想，念念不忘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并且始终想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他重视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对其领袖人物都有评价。他赞赏陈涉“奋起挥黄钺”和刘邦“斩蛇起义”的造反精神，但认为他们都缺乏远大理想，他们紧盯的也就是帝王位子和“取而代之”。毛主席比较重视张鲁在汉中建立的政教合一的政权，认为他设立的“义舍”具有共产主义萌芽的因素，他的“符水治病”可能是中医治病的一种方法，也可能更多的是心灵安慰和精神疗法。毛主席多次提到要使中国历史上那些带有空想社会主义的理想“科学化”。毛主席始终关心最广大群众的利益，他所以批评卫生部是“城市老爷卫生部”，就是因为它将大部分医疗资源都放在城市，致使广大农村长期缺医少药。他要求城市医生下乡上山，为农民送医送药，还让总理给下乡的医务工作者鞠躬，后来又推广赤脚医生，这都是为最广大群众的利益着想。他所以坚持中国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提倡集体主义，反对“包产到户”（其实就是分田单干），就是因为他认为这样做最符合广大百姓的利益。而刘、邓却不讲或很少讲共产主义理想，他们都支持“包产到户”、分田单干。

毛主席当然也有缺点错误，但不能将解放后出现的一切错误都归到他的头上。实在说来，其他人也有错误，有些错误也不比他小，而且对毛主席的错误起了推波助澜的恶劣作用。你想，就说极“左”错误吧，刘、邓就比毛主席少？在土改、反右、四清等运动中，刘不是都比毛更左吗？1958年的“大跃进”，大刮浮夸风，全是毛的错吗？1958年秋天，邓小平到贵州视察，不是认为那里粮食多得令人发愁，建议农民一天吃六顿饭吗？1959年秋，灾荒已经在全国各地蔓延，当时主管农业的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外号“谭大炮”的谭震林不是到毛主席的专列上汇报，说河北农民每人每天一斤粮食，“个个都满面红

光”，农村根本没有灾荒吗？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赵紫阳，不是在广东擅自查抄农民家里的粮食，然后写报告给中央，硬说农民“瞒产私分”，农村的缺粮并不严重吗？这些有意或无意的误导显然对毛的决策起了很坏的作用。再如“文革”中的抓“五一六”，硬是无中生有地抓了上百万的无辜者，致使数以十万计的人走向不归路，难道不是有人不断给毛主席提供假资料，误导他做出了错误决策吗？再说“文革”中的错误，如其中发生的打、砸、抢、抓、抄、杀，现在一股脑儿推给了毛泽东和中央文革，这是很不公平的。毛主席所以给这次革命起名叫文化革命，就是用文化的方式、批判的方式、非暴力的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他虽然提出过“全面内战”的口号，但也是用“文斗”的方式进行阶级斗争。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的任何人都没有提倡“武斗”，江青是讲过“文攻武卫”的话，她要求造反派“文攻”，但当走资派，特别是军队以武力对付造反派时，才要求“武卫”。而打、砸、抢、抓、抄、杀的主力，恰恰是首都工作组（叶剑英实际负责）支持的以高干子弟组成的红卫兵“联动”、“西纠”之类组织。组织斗争罗瑞卿的不是解放军吗？抓彭真的所谓红卫兵，不是由叶向真前台指挥、叶帅调动的特种兵伪装的吗？而这些事情，中央文革却根本不知道。

毛主席的伟大功绩绝不是几个小丑的狂吠能够抹煞得了的，他的人格魅力也不是几个无耻之徒乱泼脏水能够毁掉的。我特别欣赏你们山东大学教授高亨先生歌颂毛主席的那首《水调歌头》：“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眼底五洲风雨，笔下有雷声。”概括的多好啊！

孟：全国数以亿计的人中，能够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人不过千万分之几，所以您是幸运儿之一。您进入史学领域并取得引人瞩目的成果，有毛主席的影响吗？

戚：毛主席可以说是我进入史学领域的领路人和当之无愧的导师。我解放前在上海读中学时参加了地下党，1949年入中央团校学习一年，勉强可算专科学历吧？我没有经过历史专业的科班训练。进入中央办公厅工作时是一个19岁的年轻人。我从小养成的一大优点是爱读书，在办公厅干的第一个工作是图书管理员，这给了我一个得天独厚的读书机会。后来我做秘书科长、秘书局长，这给了我大量接触毛主席文字的机会。例如，《毛泽东选集》前四卷最后的校对工作是我同田家英一起完成的。当时，我们二人相对而坐，每人一份清样，从正文到注释，一个字一个字地读。他读我稿，我读他稿，就这样，我们校对完了，也熟悉了毛主席的每一篇文章。在平时的工作中，我几乎天天读到毛主席对许多文件和问题的批示，耳濡目染，潜移默化，我从主席的文章和大量批示中学习他的观点、观察问题的方法和写文章的技巧。毛主席既是伟大的革命家，又是写文章的圣手。他的每篇文章几乎都是典范。其中，马克思主义观点的高瞻远瞩，立意的高屋建瓴，辨析的鞭辟入里，用典的贴切恰当，知识的渊博宏富，文笔的华美顺畅、雅俗共赏，尤其是气势的前无古人、雄视百代，更是令人拍案叫绝，感佩莫名！这样的文章，除了毛主席，还有谁能写得出来？我如饥似渴地读毛主席的书，揣摩学习他写文章的观点和方法，开始试着写点小文章，后来为吴晗主编的历史小丛书写了《孙承宗》，再后来就是写李秀成问题的讨论文章。1964年调《红旗》杂志工作后，就彻底转到历史研究领域工作了。因为我是在历史研究领域崭露头角的，所以直到现在，还有不少人认定我学过历史专业，有人还有鼻子有眼地说我是你们山东大学的毕业生。其实都是误猜和误传。我学历史不是“无师自通”，而是有一个真正的老师，这个老师就是毛主席！他虽然没有像现在的研究生导师那样亲自对我耳提面命，但在我心目中，他是我的导师。说句玩笑话，我是在毛主席指导下读完研究生课程的。

孟：您已经年过8旬，身体还这样硬朗，思维还这样敏捷，激情还这样澎湃，不像有些落难被囚的人精神萎顿，满腹牢骚，似乎全世界的人都欠他的。您为什么能保持这样的状态呢？

戚：第一，自从参加地下党那天起，我就坚定了自己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至今没有动摇。第二，我相信李白的名言：天生我才必有用。所以在任何条件下，比如在监狱中，我也没有放弃读书学习。马列全集、《诸子集成》、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书，我就是在监狱中系统读完的。《大风起兮云飞扬——两汉人物论》、《青梅煮酒论英雄——三国人物论》等书稿也是在监狱完成的。出狱后，我更是不断地读书写作，在史学领域辛勤耕耘。人生苦短，只有永不放弃，永不言败，孜孜以求，努力奋斗，才能学有所成，在自己喜欢的领域做出一点成绩。在社会生活中，一个人的命运很多时候是自己难以把握的，但在任何条件下不放弃学习和思考却是自己可以做到的。

孟：感谢您敞开心扉、无所顾忌和发人深思的谈话。尽管我并不完全认同您的观点，但我赞赏您的坦率。作为 50 年前您的耸动视听的文章的崇拜者，我更赞赏您在学术研究上锲而不舍、老当益壮、愈挫愈奋的拼搏精神。衷心祝您健康长寿，在学术上取得更大成就！

□ 摘自《学部“文革”亲历记》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9年12月

---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华夏文摘》网址：<http://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邮箱：[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mailto:cnd-cm@cnd.org)

---